



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

◀ (上接 13 版)

回避的一环,但是我觉得月氏从河西走廊远道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建立王朝的说法,太像前古典时代的传说,传闻之辞加上想象与附会,成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里那几句话,更成为现代研究者加以发挥的基础。就如同匈奴西迁成为欧洲古典后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匈(Hun)人的那个说法,本来是一个捕风捉影的联想与想象,后来竟成为那么多学者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的前提。

法浩特说,是的,我一直有此疑惑。长途迁徙,跨越多个地区、多个文化与多个政治体,最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建立王朝,这个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传说属性,传说的特点是,类似的事情在可查证的历史上难以再现。迁徙往往是王朝历史叙述的结果,取决于谁讲述、对谁讲述、为什么要如此讲述。任何一个具体的迁徙传说,都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体系。然而,要把历史与神话传说剥离开,远不是怀疑一下就可实现。研究缺乏系统文献史料的古代巴克特里亚,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和困难。

聊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界,我说我近年在美国、德国、土耳其等国开会时遇到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学者,他们对西方学术之了解、英语之流畅、议题之新颖,都给我很深印象。我感觉,在俄苏学术传统之外,新一代学者迅速接上了西方传统,这使得中亚学术至少在某些学科,比如考古和历史学,具有了融汇多个传统的优势。考虑到俄苏有关学科的深厚传统与独特性,这种融汇是很让我们中国学人羡慕的。

法浩特说:表面看似是这样,然而存在另一种危机。现在年轻学者普遍重西方轻俄苏,有的甚至拒绝学俄语。比如说,在我们考古所,年轻学者要求我们的刊物以后仍然是双语,但不再是俄语和乌兹别克语,而是英语与乌兹别克语,这意味着学术刊物不再发表俄语文章。年青一代有些人,不仅不喜欢学,甚至也读不了俄语著作。要知道过去的中亚考古,几乎全都是用俄语出版的,不读俄语,等于

放弃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,那可是中亚知识宝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。过去父母倾向于送孩子进俄语幼儿园,让孩子从小学好俄语。现在变了,家长把孩子都送到英语幼儿园里,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学习完全不懂俄语。法浩特最后说:“我家孩子读的都是俄语幼儿园。”

那天晚上我们在铁尔梅兹市区北边的机场上飞机,飞去塔什干,次日飞回北京。在候机室,法浩特指给我看一面贴满照片的墙,我原以为是模范表彰宣传栏,走近一看才知道全都是通缉对象,几乎都是从乌兹别克斯坦跑去叙利亚参加ISIS的。法浩特问我,你注意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了吗?我仔细看一遍,对法浩特说,大部分是90后,大部分是女性。他点点头,神情凝重,长叹一口气。我想起我关注了好几年的那个重复人类迁徙之旅的萨洛帕克(Paul Salopek),他在走完乌兹别克斯坦一程后所写的报道中,提到他被沿途军警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:“你带着什么宗教书籍或音像制品?”他说能感觉到当局对宗教势力的上升极为紧张。2014年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,我听当地官员和学者说起费尔干纳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日益壮大。和抽象的形势分析不同,在机场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看到他们,你会模模糊糊地感触到中亚社会与政治的另一面,普通旅行者不容易触及的那一面。

飞机升入夜空时,我努力向南看,希望看到阿姆河。下面的铁尔梅兹市亮闪闪的,环绕它南边的阿姆河却隐藏在黑暗中,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沙漠也全无踪影。看不见月亮,即使看得见也只是弯弯如眉的一小撇,不足以照亮巴克特里亚的大地、山谷与河流。我想起抵达铁尔梅兹的那个夜晚,圆月高悬,天空明净。如果那时从空中看下去,大概会看到一条银灰色的长练,在暗夜里摇摇曳曳,由东向西,如同听到了亘古的召唤,刺穿时间,飘向远方。

(上篇见《文匯學人》3月29日4-6版、中篇见4月12日10-12版。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

## 怀念周先慎

洪子诚

周先慎去世我完全没有料到,他去世的两个多月前,我们还通过电话,讨论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问题。他当时乐观地说,虽然这么大岁数,身体还有其他疾患,做这样的手术有风险,医生也有些担心;但是与其日子过得这么辛苦艰难,走不上一百米就气喘吁吁难以为继,还不如就试试。我劝慰,但其实也很有信心对他说,这个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,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。

周先慎 1959 年从四川大学到北大中文系任教。我 1961 年毕业留校,他在中文系已经两年。我们都分配教“写作”。从 1961 年起直到 1976 年,我们都在一个“单位”:开始是写作课教研组,“文革”期间是同一“战斗队”,到了江西“五七干校”,也在一个班。我们曾一起讨论教学问题,一起在农村、干校参加劳动,一起和写作组其他教师比赛从香山饭店跑到鬼见愁再跑下来,也多次一同到颐和园游泳——那时昆明湖南岸划出一块做公共游泳场。记得 1969 年秋天我们被通知要去“五七干校”,那时强调的是要长期在农村“落户”。似乎有一种要永远离开北京的感觉,在谢冕的倡议下,有一天,他、我和周先慎三人,骑自行车从学校进城,到所谓北京地标——天安门、北海、天坛等地照相留念,用的是 1960 年代仿苏的国产 35mm 机。回来后我和周先慎还在严绍澍 16 楼宿舍,用他的放大机放大冲印直到凌晨。我和周先慎原本都住在 19 楼单身集体宿舍,后来钟必琴从四川调到北京,他就搬离 19 楼,有了像样的“家”。他们多次请我和其他老师去他家吃饭,周先慎烧的一手四川风味的好菜,特别是红烧胖头鱼。1970 年代后期写作课取消,我们各自另选专业。他去了古代文学教研室,我则选择了“当代”,我们的联系不如以前那么多了。不过,他有新的论著出版,我总会收到他的题签本。

周先慎为人正直,乐于

周先慎(1935—2018)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长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教学与研究



助人。在生活、教学、处世为人的原则上,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。他比我大 4 岁,给我很多的帮助,不仅教学,包括个人生活。他对朋友的关心是真诚的。我毕业留校开始上课还不满 23 岁,对教学一无所知。那时他已经有两年教学经验,便主动帮助我,讲解课程要求,可能遇到的问题,如何选择“范文”,以及文章分析、作文批改的方法,让我能尽快适应这个工作。那个时候,写作教学归属汉语教研室,负责主持教学小组的是教研室副主任朱德熙先生。我们一起多次听过朱先生文章分析的“示范课”,如对赵树理、朱自清和汪曾祺文章、小说的讲解,深深为他的语言敏感折服。当年,写作训练强调要让学生掌握写作“基本功”,文通字顺、篇章结构,掌握叙述文、说理文和说明文写作的“要领”。周先慎和我觉得这些要求固然必要,但我们“出身”文学专业,加上年少气盛,总想给写作教学增添“文学”、想象力的分量。曾一起想把诗、小说等纳入“范文”范围,他还计划从《聊斋》《红楼梦》中摘选一些段落。我也提出应该包括外国文学的译文,甚至如曹禺剧本的一些内容。但这些设想当时没能获得认可,很是有点懊恼。不过,后来我们都承认,这一段偏于遣词造句为中心的写作教学,让我们获益甚多;至少是明白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,而不同的叙述方式也改变了事情的面貌。

和周先慎在一起,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执着、认真。我用这两个词不是随意的。在许多时候,我有点马马虎虎,无可无不可的样子,因此,对他的不达目的不放弃的执着,印象十分深刻。那种要把自己坚信的事实、观点讲清

楚,也让对方信服的神情,和他对你陈述、说服时急促的语调,至今难忘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周先慎认为生活环境不应该成为放弃自我约束的借口,成为怠惰、纵情任性的托辞。不管什么样的日子,人总要活得高尚,对得起自己和亲人、朋友。所以,他总是在可能条件下,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。刚到江西的几个月,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煤炭等燃料供应,需要自己到附近荒地砍一种已枯萎的一年生的高大灌木当燃料。那时,他和陈铁民(后来离开北大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,是著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)是班里的“一等劳力”,总是干最重的活。他在挖稻田的排灌渠、烧砖、搭盖当宿舍的大草棚、平整土地、插秧施肥收割等劳作中,都是尽自己的能力抢在前面。

有一个“细节”是我难忘的。当时还没有宿舍,全连一百多人住在大仓库里。一天晚上在晒谷场开会,正好带拖斗的拖拉机运来大米。因为路没有修好,需要人扛进伙房——这段路有五六十米。这时,有几个人抢先走过去,坐在我旁边的周先慎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却没有动身,原因是我知道难以承担这样的重量。160 斤的稻谷麻包我没有问题,但将近 200 斤的大米,我曾经试着扛过,只能勉强走几步。当时我看到扛着麻包的周先慎走到临近伙房的时候两腿开始摇晃,幸好从旁边经过的胡双宝扶了他一把,才没有跌倒。前些年,我在校医院看病,碰巧遇到周先慎。他的腰直不起来了,说是脊椎受损。我当时立刻想起他扛麻包,以及挑砖、挑稻谷总是要比别人更多的那些情境,心里真的有无法说清楚的难受……